

論戊戌維新運動及

康有為、梁啟超



论戊戌维新运动及 康有为、梁启超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戊戌维新运动及
康有为、梁启超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296,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 11111·142 定价 3.50元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三年九月，在广东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我们从中选出二十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编成了这本论文集，力求藉此反映近年来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研究的成果及不同看法。

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专家、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谨此致谢。

目 录

在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上 的开幕词.....	张江明 (1)
关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	陈锡祺 (10)
英国与戊戌政变.....	吴乾兑 (30)
戊戌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与反帝斗争的 战略策略思想.....	罗耀九 (40)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方志钦 (65)
维新派——资产阶级改革派.....	钟阜安 (83)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曾近义、颜泽贤 (101)
一九〇〇年前后康、梁思想比较论	王有为 (132)
论康有为	徐光仁 (147)
康有为的爱国维新精神	陈旭麓 (192)
康有为与近代思想启蒙运动	吴熙釗 (196)
试论康有为的“仿洋改制”	王晓秋 (213)
论康有为的爱国主义	郑克强 (238)
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	汤志钧 (251)
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	陈华新 (269)
对梁启超的评价	蔡尚思 (297)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突破与	

- 还原 刘福祥、赵矢元 (303)
- 梁启超少年的思想 陈占标 (316)
- 《新民丛报》前期梁启超对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贡献 耿云志 (327)
-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学 黄廷柱 (346)
- 梁启超佛学思想述评 唐文权 (361)
- 戊戌维新前后的容闳及其与康、梁的关系 戴学稷、徐如 (389)
- 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
综述 王杰 (405)

在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上的 开 幕 词

张 江 明

同志们、朋友们：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北京《历史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我谨代表两个主办单位和广东社会科学界向各地远道前来参加我们这个学术盛会的史学界老前辈、专家、学者和全体与会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和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日子。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寻求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最初尝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戊戌维新运动则是属于它的一个“发展阶段”。^①这是中国近代新生的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初步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纲领，用以改革政权结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

运动。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定为工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这在当时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改革现状的。”^①毛泽东同志对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则称他们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事实正是这样，戊戌维新运动以“爱国”、“革新”为旗帜，不但从思想上对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提出了新的、强有力地挑战，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对现存的封建专制的旧制度予以深刻的震撼和冲击，从而开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篇章。戊戌维新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又为后来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在近代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历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这次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出现的。它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着法国式和日本式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多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③在《邓小

①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③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平文选》的注释中说明：“明治维新是从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府制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借鉴日本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一个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实行君主立宪的改革方案，作为变法维新的政治指导。他们的改革方案，尽管有着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色彩，例如，不敢触动封建土地制的根本改革，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进行维新，不敢依靠人民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后来甚至成为保皇派，反对经过革命推翻封建皇朝，但是，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同样，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两位主要倡导者，他们的历史业绩和地位也是不能抹杀的。

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位历史人物，在我国近代史上虽然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回顾以往大半个世纪，对于这个运动及其人物的研究，却又是远远不够。建国以前姑且不谈，光就我国建国后这三十三年来说，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虽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薄弱。据粗略统计：近三十多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专门研究戊戌维新运动的论文和著作，共计还不到二百篇；而同样作为近代史重要研究课题的，有些却多达二千余篇。这说明我们对于维新运动及其人物的研究，确实是太少、太不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众所周知，归根结底，还是在于长期以

来思想上、理论上受到“左”的影响。当时有一个看法，认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失败，认为它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是在政治上走改良主义即修正主义的道路，应予以贬斥。到底是不是这样？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探讨。但无可讳言，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这种说法似乎成了正面评价维新运动的一种“极限”，如果有谁想越过这种“极限”，提出进一步的肯定看法，就有吹捧改良主义即修正主义之嫌。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开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研究的巨大困难，使这一课题在不少史学同人心目中，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禁区。要么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要么把不同意见藏在心中，忍隐不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那种萧条冷落的局面。如果说，在过去二、三十年，特别是十年浩劫当中，我国的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曾普遍地受到“左”倾思潮的荼毒和摧残的话，那么应当说；关于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研究这个领域，尤其是一个“重灾区”。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形势不同了。自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横行泛滥一时的“左”倾思潮已经受到清算，并将继续予以克服，科学的尊严重新受到保护和公认，我们的史学研究也重新恢复了它应有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并且被纳入我国向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建设精神文明的轨道，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史学园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为我们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

为、梁启超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对此，我们在座的史学界同志们、朋友们无疑早已认识到，而且已经积极地付诸行动了。而今天，我们广东省社联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目的也同样在于为大家提供一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从容论道，各抒己见的机会。如果大家觉得，它对于进一步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使史学园地中这荒芜的一角迅速繁荣起来，多少还有一点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在筹备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我们还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注视着，目前，一个以努力实现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总任务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工作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正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兴起。这场改革机构、改革经济体制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能否兴旺发达，人民能否富裕幸福。这不仅仅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全体爱国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从要求繁荣、富强和爱国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包括当年维新爱国志士们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们的理想。尽管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同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改革，从性质、社会基础到内容、目的都根本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先人们的爱国热忱、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从而对于他们所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科学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到借鉴，把当前的改革工作健康地、胜利地推向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开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它之所以能对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有所裨益，是就这样一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的，即：在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政治经济提供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始终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由此去寻求达于真理的道路。在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研究的过程中，我想，也同样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和学风。

鉴于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受到“左”倾思潮的横蛮压制和禁锢，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清除“左”和右的影响，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我们不但要看到历史道路的必然性，还应当看到历史道路的曲折性；不但要看到运动的局部和表面，还要看到运动的全局和实质；不但要看到它的失败，还要看到它的成就。对于历史人物，也同样不能只看到他们保守和错误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前进和正确的一面；不能局限于责备他们没有为后人提供什么，更应当看到他们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不能光指责他们思想行动上的踌躇和摇摆，而应当更多地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总而言之，我们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与评价，既不能任意否定、贬斥，也不能随便拔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斗争水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多地进行深入细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研究。这对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会有好处的。

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在过去虽然比较

沉寂，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较明显的改变。在我国史学界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维新运动的呼声正日益高涨；不少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已重新把这一课题列入规划，并组织力量专门负责，进行研究；各地的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日益增多，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启发性的新见解。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是我国史学园地春色越来越浓的又一标志。尽管这件工作还刚刚开头，与其他一些研究课题相比，还显得比较落后，未能尽如人意，但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只要假以时日，史学园地里的这长期受到冷落的一角，必将繁花竞放，果实累累。对此，我们怀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时间不长，连参观访问在内，一共才九天，但是，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却很多。为了使会议开得更集中一些，讨论更深入一些，建议大家对于以下两个重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其中包括这次运动的性质，究竟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还是一次力图将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还是没有超出洋务运动范畴的政治尝试？它的历史作用如何？有没有进步意义？过去说这个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改良主义运动走不通。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该怎么看？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胜利？对于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生的“功”与“过”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

二、关于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爱国思想和改

革精神的探讨与评价。如何正确估计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革新精神，以及他们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所起的启蒙作用？这些思想在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历史、文学等各方面有着什么具体的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表现、影响如何？革新精神的内容、特点、作用如何？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其中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等等。

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邓小平同志认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①他还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②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方针，坚决贯彻执行。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要用两点论进行分析：既要看到历史的全过程，又看到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情况，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作出衡量。决不能因为后期的“过”而否定前期的“功”，也不能因为前期的“功”而掩盖后期的“过”。我们必须采取公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要以探讨真理的精神，同志式的、平等的、商量的方式，心平气和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2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69页。

进行商榷、讨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互相探讨，互相启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求得一个比较好的成果，逐步地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认识。

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自去年开始计划筹备以来，得到了广大史学界同人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不少同志就如何开好这个建国以来首次有关维新运动的学术会议，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许多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给我们带来了有份量的文章或著作，其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富有创见的观点。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故乡——南海县和新会县为迎接会议的召开积极地进行了准备，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这一切，都为我们开好这次讨论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我谨代表会议筹备组向大家致以深切的谢忱。同时，也应当说明，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不足，加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次会议还是准备得很不充分，也有一些工作缺点，特别是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准备了论文，要求前来参加会议，我们本来也准备发出邀请，但因为限于名额，最后还是不得不割爱。这是我们深感遗憾，并必须对他们表示歉意的。幸而我们这个会议虽然是头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希望而且深信，今后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和广大史学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必然会越开越兴旺，关于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也必然越来越全面、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一个与我们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局面必然会到来！

谨预祝学术讨论会成功！

谢谢大家。

关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

陈 锡 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几乎同时开始。这两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虽然结束的时间有先后，目标、路线不同，但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探讨一下这两个运动的异同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可以使我们更正确地评价这两个运动，并更清楚地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线索。

一

一八九八年，在民族危机极端深重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这次变法，经过了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几年的活动和酝酿。如果说，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第一次向皇帝上书要求变法，还是一个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的个人行动的话，那么，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则说明康、梁等人要求变法

维新的活动已汇合为一场政治运动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戊戌维新可以说是从“公车上书”开始的。

以后几年间，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进行活动，他们继续上书皇帝、游说公卿，希望统治者支持变法；同时又著书立说、发表文章，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出版报刊，作为鼓吹变法的阵地。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给清末沉闷的社会带来了一派新风气。这样，终于出现了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

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中，康、梁等人力求把变法维新的主张付诸实践，他们通过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发布了一批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除旧布新的新法令。无论是改良派还是光绪皇帝，都没有什么实力，顽固派一反攻，“百日维新”就失败了。光绪被囚，康、梁出走，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至此结束。

这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和变法以前的维新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其进步意义和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估价。它往往笼统地被称作“改良主义运动”，而对其进步意义，即使肯定，也十分有限。而且流行一种说法：戊戌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它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十年内乱期间，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积极作用更被一笔抹煞。这是很不公正的。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而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从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政治主张